我守的是桥　桥守的是我

中国摸清廊桥文物资源家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2193座——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廊桥文物总数。

俯瞰之下，它们枕山栖水、连陌通乡。这些桥不只是“桥”，还藏着中国乡村千百年来的生存智慧、情感记忆与协作精神。

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起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守护廊桥文化遗产。如今，这场历时三年的守护行动，有了回响。



福建是我国廊桥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现存文物廊桥547座。宁德市寿宁县、屏南县被誉为“中国木拱廊桥文化之乡”。图为位于宁德市屏南县的万安桥。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日前，在北京开展的“守望——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成果展”上，观众在参观。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为什么是廊桥

就文物建筑来说，廊桥是一个小门类，但它是探索文物建筑系统性保护路径一个很好的切口，这也是廊桥保护三年行动的重要价值所在。

为什么是廊桥？福建博物院院长楼建龙告诉记者，首先，廊桥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即保护风险较大。

从地理位置看，廊桥多矗立于溪涧之上，长期暴露在风吹日晒雨淋之中，面临木材老化、虫蛀、霉烂等病害。此外，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对廊桥的威胁也时有发生，而洪水与火灾，是廊桥面临的两大主要威胁。

其次，廊桥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看，它既用于通行，也常常成为一个地方的标志。如今，廊桥也是乡土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廊桥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楼建龙说。

在他看来，与其他文物相比，廊桥的情感价值尤为突出。从古到今，在一些区域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廊桥始终是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突出的实用价值，但除此之外，情感上的分量同样不可忽视。这种情感价值，恰恰契合今天我们所说的‘乡愁’‘记忆’等文化符号。”

楼建龙用“沟通纽带”来描述廊桥。“廊桥的沟通是全方位的，从实际空间来说，它起到跨越、联通的作用；从研究角度来说，它可以沟通古今；而情感沟通更是其独特之处。所以，从时间、空间和情感3个方面来看，廊桥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综合体，值得重视和保护。”

从现实保护的紧迫以及廊桥的独特价值层面看，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可谓应时发起。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喆认为，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是文物保护理念和工作模式的一次升级，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系统性。

在系统性保护框架下，廊桥保护不只修桥，还保护营造技艺、民俗传统、附属文物、周边环境，形成从调查、记录、测绘、勘察、研究、修缮、防控、管理、展示、利用、宣传的完整链条。“值得一提的是多方协同——国家层面制定行动计划，各地结合实际编制实施方案，专业机构承担调查、测绘和技术研究，把分散的工作组织成了一项全国性、协同性的保护实践。”张喆说。

从1355座到2193座

“廊桥”一词，见于中国建筑史学家刘敦桢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中国之廊桥》，取自白居易《修香山寺记》“登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

从名称上看，廊桥亦称风雨桥、花桥、亭桥、厝桥，核心特征是桥上架设廊屋。中国现存廊桥多为明清至民国遗存。结构上，以木构或石构的梁桥与拱桥最为常见；跨数上，因地制宜，一跨过溪或多跨连岸。

保护廊桥，首先需要知道的是“有什么”。由于廊桥多分布在山区乡村，隐藏于溪谷之间。有些廊桥有历史记载，有些则依靠当地老人讲述保存记忆。如果不了解家底，保护就会受限。因此，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先从专项调查开始。

2023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式启动。各地将廊桥专项调查纳入普查体系，这是首次将全国范围的文物建筑精确统计到单体的专项调查。工作人员深入乡村，逐桥踏查，摸清了各地廊桥的存量、分布与保存现状，对廊桥文物底数形成了全面认知。

数据显示，专项调查共登记廊桥文物2193座。湖南、四川、重庆、湖北、贵州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增幅明显。甘肃18座、山西6座廊桥的发现，打破了“廊桥只在南方”的旧有认知。

从行动之初筛查的1355座到如今的2193座，廊桥数量为何有这样的增长？楼建龙解释，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部分廊桥地处偏远，过去未被发现，这次全面梳理后自然有所增加；二是廊桥最难保存的部分是桥面以上的木构建筑，一些桥因木构留存较少在过去并未被认定为廊桥。“此次保护行动中，我们对原有资料重新判断，对有疑问的桥反复论证，并进行了新的认定。”楼建龙说。

摸清廊桥资源家底，不仅意味着数量增加，更意味着价值认知的提升。在传统认知中，一座廊桥的历史，多依靠地方志、村民记忆和工匠经验传承。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信息可能逐渐消失。如何让廊桥的历史信息长期保存？答案是建立系统档案。

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期间，工作人员运用测量、检测等现代技术，对廊桥进行全面记录和数字化存档，让其拥有了“数字档案”——2193座廊桥全部完成基础信息采集与图像收录。

在正在北京举办的“守望——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成果展”现场，跟随策展人蒋名未的讲解，三年来的保护成果逐渐清晰地铺展开来：我国廊桥文物资源总数增至2193座，较行动前增长了61%；完成基本测绘767座，精细化测绘建档247座；中央、地方财政与社会力量累计投入资金2.86亿元；出台廊桥保护地方性法规规章9项；实施保护修缮工程177项、安消防工程107项。

廊桥连接记忆

桥上，有人来往，有人祈福，有人聊天，有人歇脚……一座廊桥，不仅可以通行、避雨，更代表着一种乡土生活，是村民议事、祭祀、祈福的公共空间，也是村落承载日常功能、安放精神寄托的场所。

正如楼建龙所说，每一座廊桥都不是无缘无故建在某处——它的选址、形态，连同周边的附属建筑，往往都经过仔细考量，与村落的进出方向、整体格局密切关联，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村庄空间中的“点睛之笔”。

对于当地人来说，桥连接的不仅是道路，更是记忆。在楼建龙看来，廊桥之所以承载那么多记忆，是因为这里发生过太多故事。这些故事不只来自廊桥的建造过程，更多是在日常使用中慢慢积累下来的，“它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记录着乡村生活的变化，也像一根纽带，把人们的情感紧紧连在一起”。

正是人与桥之间的情感联系，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守护廊桥的队伍中。

2016年，受台风“莫兰蒂”影响，浙江省泰顺县的三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廊桥——文兴桥、文重桥、薛宅桥被洪水冲毁。灾难过后，乡民们自发搜寻被冲散的桥身构件，期待有朝一日能够重建。他们中的许多人世代生活在这里，廊桥早已融入日常。由于抢救及时，3座廊桥的绝大多数原木构件被找回。这些构件成为廊桥修复的重要依据，为3座古桥重现原貌奠定了基础。

经过1年多的修复，3座廊桥重新回归。在文兴桥守桥数十年的蓝振城老人也回到了老地方，继续守护着这座桥的一石一木。

不只在泰顺，3年实践，让越来越多村民从“旁观者”成为“参与者”——风雨来临，他们组织队伍自愿护桥；节庆时分，他们走桥摆宴祈福迎新；面对游客，他们主动讲解廊桥文化。今天的廊桥，已经成为人们维系故土、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

守桥人的话语朴素而有力：

“廊桥就是我们家的老祖宗，照顾老祖宗，天经地义。”

“大水来的时候，大家不是去抢救自家东西，都去捞桥的构件——桥在，村子就在。”

“等我老得走不动了，就坐在桥头，让桥再守一守我。”

……

这些朴素的心声，正是人与桥之间无法割舍的纽带——桥守护着人的往来，人守护着桥的存续。

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

回望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其特点之一是格外关注文物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协同推进。

文兴桥的修复由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泰顺县人曾家快主持。他和修复人员将找回的1200多个构件精准复位，恢复了廊桥往日样貌。

曾家快出生于当地的木匠世家，师从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直机。2016年，他成立了“曾家快木拱桥工作室”，致力于浙闽地区的木拱桥修建、展示与文化传播工作。这些年来，曾家快正式收徒8人，还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让女儿跟随他学习造桥技艺。

确实，廊桥的持续保护修缮，带动了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让传承人得以在修老桥、建新桥的实践中带徒授艺，使传统营造技艺后继有人。

尤其是2024年12月，“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正是文物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推进最扎实的成果。

如今，桥头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返乡青年在桥头开的咖啡店、书屋、文创店为古桥增添了一抹青春亮色。

文兴桥95后守桥人翁泽毅就在桥畔开起了咖啡馆。“守桥不只是守在那里，还得保护它。大家被文兴桥吸引，来到咖啡馆，向我询问文兴桥的知识，我把自己守桥过程中了解到的讲给他们听。”在翁泽毅看来，这个互动过程正是他用咖啡馆主理人和守桥人的身份，保护、传承文兴桥文化的过程，“廊桥更需要被听懂，被传承”。

“最好的状态，是让廊桥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有当地人日常穿行、休憩，让它在烟火气里得到长久的守护。”张喆说。

桥的这头，连着乡愁与历史，桥的那头，还有长路要走。



日前，“守望——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成果展”在北京开展。图为在展厅内搭建的局部实体廊桥展区。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读懂廊桥

张　喆

在很多人眼里，廊桥是一座有顶的桥，能遮雨、能通行、能歇脚。其实，廊桥不是孤立的古建筑标本，而是由建筑本体、传统技艺、历史环境与社区生活共同构成的活态文化遗产，它的价值是多层嵌套、彼此支撑的。

首先是建筑技术价值。闽浙山区地形崎岖、溪流纵横，廊桥因地制宜地化解了跨河通行、结构承重、材料适配与气候防护等多重难题：编木拱架巧借木材力学特性，依靠榫卯搭接形成大跨度拱架即可跨越山涧；廊屋遮蔽既保护木构免受风雨侵蚀，又为路人提供歇脚避雨的空间，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对自然规律、地方材料与工程技术的深刻理解。

其次是社会文化价值。一座廊桥往往就是一部浓缩的村史。桥面空间是乡村的“公共客厅”：村民在此休憩议事、赶集交易、祭祀祈福、纳凉看戏；婚丧嫁娶的仪式、岁时节庆的庙会、口耳相传的乡土故事，都在桥上发生、沉淀，不断赋予廊桥鲜活的社会意义与情感内核。

再者是非遗传承价值。廊桥背后是延续数百年的营造传统，工匠世家通过口传心授代际传承造桥技艺，编木拱架、构件制作、整体架设等核心技术，在一次次营造与修缮实践中活态延续，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技艺的重要分支。

最后是乡村治理价值。传统廊桥多由村民集资共建、共管共护，村落划定“桥山”“桥林”保障木料供给，设立“桥田”“桥会”支撑日常运维，形成了一套自洽的乡土资源管理与公共协作机制，凝结着传统乡村的治理智慧。

这四重价值共同构成廊桥作为文化遗产的完整面貌。因此，保护廊桥不能只盯着建筑本体，而要把与之相关的技艺传承、社区生活和治理传统都纳入视野。

过去十几年，廊桥保护始终紧扣建筑本体安全这条底线，走过了一条从“被动抢救”到“主动防控”的发展路径。早期的工作重心集中在险情处置、抢险加固与灾后修复上，核心是解决“保得住”的问题。随着保护理念的升级，工作不断向前端延伸：定期排查结构变形、构件糟朽等隐患，开展防腐防虫、屋面清漏等日常维护，把小病害处置在萌芽状态；系统完善消防、避雷等安全设施，布设水位、火情监测预警设备，配套分级应急处置预案，大幅提升了风险应对的主动性。

2023年启动的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保护提升到系统性的新高度。这种系统性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保护对象的完整性。以往保护主要关注廊桥本体，三年行动则把碑刻匾额等附属文物，古道、祠庙、路亭等关联环境要素，以及营造技艺和民俗传统都纳入了保护范围。系统性保护不是把这些要素简单打包，而是维护它们之间原生的、内在的联系。

第二个层面是保护行动的链条化。从资源调查、价值认定、测绘建档，到保护修缮、风险防控、日常维护，再到展示利用、宣传传播，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形成有机整体。以浙江为例，三年行动中首次厘清了296座廊桥的完整清单。这个“摸家底”的过程并不容易：廊桥分布分散，一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历史资料零散，各地称谓不一，官方记载寥寥，很多时候要从村民口述中寻找线索；各地廊桥形制丰富，桥头局部设亭、桥身无廊的建筑是否纳入范畴，需要反复论证、统一标准，才能保证清单的严谨性。

第三个层面是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廊桥保护涉及文物、文旅、自然资源、水利、消防等多个部门，也需要专业机构、传统工匠、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系统性保护要解决的不只是“保什么”的技术问题，更是形成保护合力的协同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文物保护与非遗保护协同推进，是三年行动的一大特点。传统工匠熟悉木构营造的传统工艺，参与修缮能最大限度保留廊桥的传统形制与工艺细节；同时，修缮老桥也是最好的技艺实践，传承人在真实工程中带徒授艺，比纯理论教学更有效。浙江泰顺等地很早就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引入修缮工程，文重桥、文兴桥、薛宅桥灾后修复，以及北涧桥、溪东桥等国保单位修缮，都有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全程参与核心工序。2024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正是这种协同推进的有力成果。

回顾这些年廊桥保护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系统性保护的可行路径，看到了活态传承的蓬勃生机，也看到了廊桥赋能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三年行动是一个新的起点，守好前人留下的遗产，望向更长远的传承，这是我们这代文保人的责任，也是最有意义的事。

（作者单位：**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

观古